

乡村振兴中的「新角色」

位于浙江省中部、主要分布在钱塘江上游流域的上山遗址,被认为是世界稻作文化的源头。考古成果证明,约一万年生活在此的先民已经开始建立村落,种植水稻并加工食用。

在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的2021年,在曾经诞生了最早“庄稼人”的地方,浙江被列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且正在见证全面推进的乡村振兴。

如今的浙江乡村,不止有依靠农业生产的“庄稼人”。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创业创新等催生了更多乡村振兴“新角色”。

“我在乡村当经理”

50岁的杭州市淳安县人黄立法,现在有了一个新身份——农业经理人。

去年夏天,大下姜振兴发展有限公司公开招聘总经理。该公司由下姜村及周边其他二十几个村集体入股成立,旨在打造“大下姜”这一“乡村振兴联合体”。黄立法击败了其他30多名竞争者应聘成功,签下两年合同。

目前,黄立法主要负责组织收集、加工、包装“大下姜”范围内村民的特产,并以统一品牌在线上推广销售,公司也负责整合域内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推介。他曾在旅游行业和啤酒公司都有过多年营销经验,恰好胜任这一职务。

“与之前在啤酒公司相比,现在的工作收入谈不上高。”黄立法说,“但是我生长在这里的乡村,有一种故乡情结,希望能为家乡多做贡献。”

根据2019年人社部的定义,农业经理人在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中从事农业生产组织、设备作业、技术支持、产品加工与销售等管理服务的人员。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支持农民合作社聘请农业经理人”。

黄立法觉得,虽然被称为“经理人”,但对这一岗位来说,责任比利益更重要。“现在最大的责任是帮助村民用农产品变现挣钱。”黄立法说,“我希望起到桥梁的作用,让村民最大地获益。”

去年下半年公司实现了40万元的利润,一半拿出来给各个村分了红。今年县里给黄立法定下了全年营收1000万元、利润120万元的任务。

“工作压力很大,我不想辜负乡亲们的期望。”黄立法说,“但是动力也很足,因为国家十分重视乡村的发展,乡村振兴前景光明。”

“我在乡村教创业”

在嘉兴市凤桥镇联丰村,村农产品交易展示中心中有一间工作室属于凤桥青年创业者协会。每周总有一两次,来自凤桥各村的会员们会在这里交流创业心得,进行头脑风暴。

44岁的会长俞红平有着20余年创业经验,目前在经营一家智能家居领域的公司。初创于2012年的协会现有300多名会员,约九成是凤桥各村青年,约三分之一是农业领域的创业者,也有一部分做乡村旅游等服务业。

“年轻人创业往往激情很足,但是缺少方向性和经验。协会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俞红平介绍,与城市中的创业青年相比,农村创业者受限于文化水平等因素,更需要指导和交流。

2019年,协会帮助创业者申请了3500多万元的创业贷款。通过协会搭建的电商平台,当地特色的水蜜桃等农产品得以销往全国各地。协会还经常组织迷你马拉松等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来凤桥旅游。

“十几年前部分创业者有了钱之后,没有管理好自己的财富。现在协会经常组织会员进行素质培训、体育锻炼等活动,让创业者更好地利用业余时间,改变了很多人的精神面貌。”俞红平说。

现在协会收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入会申请,俞红平打算今年招聘一名专职的秘书长来打理日益繁杂的事务。

今年是建党百年,嘉兴的红船和南湖革命纪念馆是红色旅游的人气目的地。俞红平认为这也为凤桥提供了机遇,协会计划对当地的农副产品和乡村旅游资源做进一步的整合推广。

“我回乡村当支书”

五年前,姜丽娟还在杭州一家设计公司工作,帮助顾客设计室内装修。如今,姜丽娟每天要考虑的是如何设计家乡下姜村的发展。

从一名城市白领到下姜村党总支书记,这样的改变开始于2016年母亲打来的一通电话。电话里母亲说村里正在推进乡村旅游,家里正在考虑开一家民宿。

姜丽娟也发现了村里这几年的变化。原来的下姜村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民经济收入依靠养蚕、种茶,生活水平不高,家家户户养猪也污染了环境。随着新公路开通和乡村环境整治,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来到下姜村。

2016年冬天,姜丽娟离开了生活8年的杭州,回到下姜将自家的房子改建成村里第一家精品民宿。“既能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又能照顾父母。”她说。

在自己参与设计装修的民宿内,姜丽娟经常和外地的房客分享下姜村发展的故事。这样的精品民宿很快成了“抢手货”,在旅游旺季客房基本每天都会被订满。

作为返乡创业成功的代表,姜丽娟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2016年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18年成为党员,2020年被选为村党总支书记。

如今32岁的姜丽娟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常常工作到晚上10点,几乎没有周末。她还经常去全国各地参加活动,介绍下姜村的发展和自己的返乡创业的故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下姜年轻人回到家乡。如今村里开了30多家民宿,2020年全村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00多万元。也有杭州毕业的大学生,在姜丽娟的鼓励下回到下姜担任村党委委员。

“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现在幸福感很高。”姜丽娟说。“在我家门口创业实现了梦想,现在我又有了更大的梦想。”

(记者李忠发、孟娜、张博文、马剑、殷晓圣)
新华社杭州电

从“品乡愁”到“研学游”:福建客家古村落因“文”而兴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齐菲、董嘉辰)“这几天的生意太好了,许多游客说下次假期还要来看看我们原汁原味的客家古村落。”培田民宿吴家大院负责人吴晓明说。

位于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宣和乡的培田古村落始建于南宋,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是中国现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客家古民居建筑群。在这里,有着140多年历史的吴家大院只能算民居里的“小辈”。

今年33岁的吴晓明是培田吴姓第24代。小时候,村里的古旧小巷和传统老宅就是他和小伙伴们天然的游乐场。变化始于2000年,连城县着手对培田进行保护性开发,此后一批古建筑陆续被改造为研学基地、主题陈列馆和特色民宿等,包括吴家大院在内的古老民居渐渐开始了新故事。

“2017年底我们组织台青冬季旅游,培田古村落是其中一站。初到时,这里给了我们很大震撼,因为在台湾看不到这么大

面积、保存这么好的古村落。”来自台湾新北的厦门北站台湾青年双创基地创始人刘柏萱回想起自己和培田的初遇,依旧充满惊喜。

彼时,吴家大院可口的饭菜和庭院中一株安静绽放的梅树给他和台青们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当刘柏萱需要为乡村研学创作工作营寻找目的地时,客家氛围浓厚的培田古村落和吴家大院立刻成为首选。

2019年8月,他带着约50名两岸大学生专程回到培田,深度体验。5天时间,学生们徜徉在鹅卵石铺就的古老街巷,流连在一处处精美的牌坊、民居、戏台,希望为当地研学教育、文旅文创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们让学生们自己设计研学路线和课程,并帮助培田构思视觉设计方案。去年吴家大院的整修改造也吸纳了我们提出的想法。”刘柏萱说,培田的客家古建筑、客家

民俗和耕读传家的文化,其中有很多内容都值得挖掘。

30余幢高堂华屋,21座宗祠,6个书院,2座牌坊和1千米古街……建筑,有时不仅是一个具象的物,其背后更承载着一地的历史、文化、风俗和人情。

中国早在2012年就已印发《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经过5次全国性调查,目前共有6799个古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古村落只是物质载体,文化才是民族的精气神。”出生于1944年的吴美熙老人被称为培田客家文化的活化石,他于2001年发起成立培田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研究会,系统收集历史材料,为当地保护更新出谋划策。他认为,没有更新就谈不上保护,要让古村落的建筑与文化在保护中古为今用,得以发扬,这才是最

终目的。

清明春耕祭神农,元宵户户舞龙灯。近年来通过一系列保护发展,培田古村落留住乡愁的同时吸引了不少旅客前来游览。连城县文化和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培田古村落共接待旅客近3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700万元。

从事两岸青年交流多年,刘柏萱认为培田古村落从自然到人文,都有着难以复制的独特优势。台湾有众多客家人,两岸同根同源,培田古村落是绝佳的台湾青年研学基地。

“下一步,我们计划与当地合作设立两岸客家文化馆,吸引更多台湾青少年来培田研学交流,感知崇文重教,体验耕读传家的客家文化;同时将邀请两岸研学、教育从业者及文旅人才,为打造‘培田两岸研学村’出一份力。”刘柏萱说。

从“贫穷洞”到“致富窑”:黄土高原老窑洞因“游”而火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姚友明)游客程尚志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旅游时,对所住的杨家岭石窑洞印象深刻:“窑洞的外形很有特点,而且里面设施很齐全,能洗热水澡还能上网。这种特殊的住宿体验,让我觉得不虚此行。”

不仅是现在的游客,早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第一次来到延安时,就对这种依山而建的房屋有过关注。

“在整个西北,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了习惯,都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国人称之为窑洞。可是这种窑洞同西洋人所说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窑洞冬暖夏凉,易于建造,也易于打扫。”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

1935年的一个晚上,饥饿且疲惫的中央红军到达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毛泽东就曾在张湾子村村民张瑞生家里的窑洞住过一晚。

“毛主席他们好像是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到的我家,当时家里人给毛主席准备了羊肉臊子揪片,主席还夸了我父亲,说他做饭做得好。”张瑞生说。

在延安市宝塔区冯庄乡康坪村,住了快一辈子窑洞的徐俊富对窑洞的变迁感受颇深。

“以前有些土窑洞,第一个不安全嘛,要塌方的话人都没了。现在石窑洞安全而且结实,像我这个窑洞,它再挺个三百年绝对没问题。”他说。

土窑洞曾经被认为是贫穷的象征,不过延安在2019年就向世人宣告,这块中国革命圣地已经告别了贫困。

窑洞,这种人类最早的居住形式之一,目前仍遍布黄土高原。窑洞独特的建筑结构,使其具有良好的隔温隔热作用,即使是在超过30摄氏度的炎热天气下,在窑洞里也能感到凉爽。在冰冷的冬夜,窑洞里的

灶台就派上用场了,做饭时,灶台里的热量会传到炕上,使得屋里也变得舒适、温暖。

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说,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前身)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家建在防空窑洞里的高等学府。

如今的延安大学,仍然能看到窑洞。据介绍,延安大学这240多孔隙窑洞,建于20世纪70年代,在那个窑洞群中,曾经走出过路遥这样的文学巨匠。

“窑洞某种意义上说,孕育了陕北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冯庄乡党委副书记白喜军说。

2018年起,冯庄乡康坪村将闲置的窑洞改造成了民宿。新改造的窑洞民宿既保留了传统的火炕、土灶台,也安装了无线上网、有线电视等现代设施。村民们把窑洞流转给合作社,每月每孔窑洞

能收到200元的流转费用,按照一个院子有4孔窑洞计算,每户村民每年光流转窑洞的收入就能达到近万元。

此外,有的户主在旅游公司上班,负责打理自己的院子,每月还能再增加一份打工收入。

徐俊富虽然没有参与流转,但他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小卖部,一年下来也能赚到几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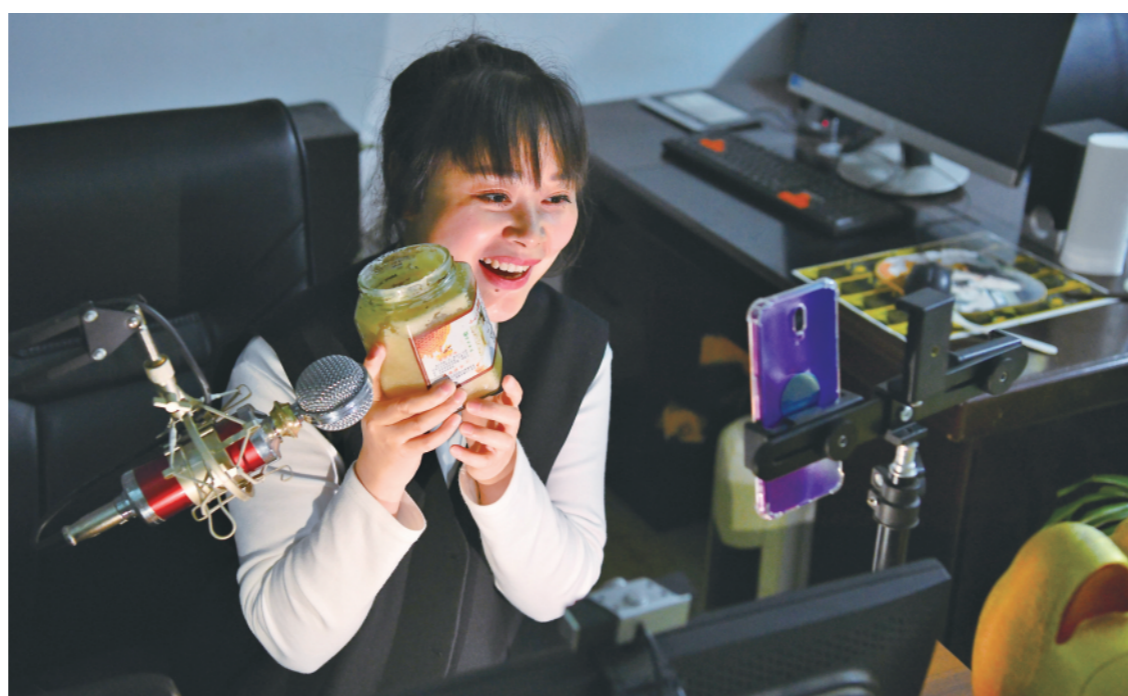
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去年康坪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超过1.7万元,高于2019年的水平。

“我们一方面保证窑洞流转费用不降,保运转,保就业,同时帮助村民销售果蔬,通过多种渠道稳定收入。”白喜军指着康坪村蔚为壮观的窑洞群说:“今年的旅游收入肯定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乡亲们的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乌蒙深处,青春在“蜂”中飞扬



上图:袁小梅与父亲在检查蜂箱里蜜蜂的生长情况。下图:袁小梅通过网络平台在直播推介她的土蜂蜜。右图:袁小梅在检查蜂箱时不慎被蜜蜂蛰伤鼻子(均为4月28日摄)。



暮春时节,在乌蒙深处的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水东镇柏那村,“90后”养蜂人袁小梅在群蜂飞舞的山野里整理蜂箱。

在袁小梅小时候,蜂蜜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在她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让乡亲们都能吃得起原生态的蜂蜜。

2019年,曾在福建经营美容院、服装店的袁小梅看到家乡青山绿水、百花常开的生态环境,毅然回到家乡创办了纳雍县小龙女土蜜蜂养殖基地,并把养蜂技术无偿地分享给乡亲们。

在学习养蜂的过程中,袁小梅被蜜蜂蛰过多次,也曾遭遇许多困难和质疑,但她凭着对这份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借助电商平台,让土蜂蜜远销国内外市场,带动周边村寨发展蜜蜂养殖600多箱,年产值近百万元。

面对家乡的绿水青山,袁小梅还有很多计划。因为目前蜂蜜产量跟不上销量,她要把蜜蜂养殖产业发展壮大,培养和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参与到这项“甜蜜事业”中来,一起增收致富。“要将家乡这连绵的绿水青山转为村民的‘绿色银行’,这是我心里的甜蜜梦想。”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影报道

